两位独臂将军与白求恩

■余海玉 李 放

军史撷珍

“从小长辈就跟我说，要不是白求恩医生，哪有后来的你呀！”每次提起抗战时白求恩对父亲的救命之恩，彭少江都十分感慨。

彭少江的父亲彭清云，曾是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一名教导员。抗日战争中，他和另一位指挥员左齐，均右臂中弹，严重负伤。危急时刻，及时为他们做截肢手术、挽救他们生命的都是加拿大籍医生白求恩。1955年，彭清云、左齐都被授予少将军衔，人称“独臂将军”。他们终生感念白求恩的救命之情。

1939年11月12日，白求恩大夫病逝。边区军民为他建立了庄严的茔墓。 沙 飞摄

一

1938年9月，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数万兵力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围攻。10月28日，日军独立第2混成旅旅团长常冈宽治由广灵到灵丘督战。我第359旅获悉这一消息后，旅长王震迅速命令第719团和第717团在张家湾、邵家庄等地伏击敌人。担任此次主攻任务的是第719团第1营，教导员正是彭清云。

当日军进入我伏击圈后，我军立刻发起进攻，日军乱成一片。此时，彭清云发现有个日军军官在指挥抵抗，判定他肯定是个头目。枪法出色的他迅速瞄准射击，击中了这名日军军官，后来才知道他正是常冈宽治。

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赶来，彭清云迅速指挥部队打扫战场。就在他即将撤离战场时，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臂。

彭清云被战友们紧急送到了前方医院。由于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和频繁“扫荡”，医院缺医少药，医护人员只能简单为他处理，并抬着他向后方转移。当他们到达灵丘河浙村的第359旅后方医院第一卫生所时，彭清云已经昏迷。

彭清云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的状况：“经过两三天的治疗，从表面上看，伤口好像有些愈合，实际上伤口已经严重溃烂，整个右臂肿得闪着亮光。大约五六天后的一个中午，我突然觉得右肘处像是虫子在蠕动，赶忙挽起棉衣袖子，只见大股大股的鲜血正从伤口里往外涌，这是因为动脉血管破裂造成的。”可以想象，当时的病情已经万分危急，再不截肢将无法保住性命，但旅里根本无法进行如此高难度的手术。于是，大家想到了白求恩。

早在几个月前，白求恩到达中国后，冲破重重阻挠，终于抵达延安。在那里，他受到热烈欢迎，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了他。白求恩坚持要去前线救治伤员，最终，他从延安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。

当时通信条件落后，第359旅并不知道白求恩具体所在位置。情况紧急，战士们抬着彭清云朝着猜测的方向一路小跑。没走多久，彭清云右臂的血管就崩开了，大家赶紧拿绷带勒着。就在大家快要绝望时，一个近乎奇迹的场景出现了：白求恩骑着马正从远处飞奔过来。战士们激动地大喊：“白求恩来了！”

原来，此前旅里派出的通信员找到白求恩。得知消息后，白求恩迅速骑马出发，刚好迎上了彭清云。他检查彭清云的病情后，立马让大家抬着彭清云返回最近的河浙村，准备进行手术。如今在河浙村，依然保留着白求恩给彭清云做手术的窑洞。当时被抬上窑洞“手术台”的彭清云，因为连日高烧、失血和伤口感染已经耗尽体力，右臂肿胀得吓人，皮肤紧绷发亮，已呈青紫色。

这伤情，远比白求恩想象的糟糕。他当机立断：马上输血，然后截肢！在场的人都沉默了——条件如此艰苦，去哪找血源啊！据时任旅卫生所所长李朝选回忆，战友们纷纷伸出手臂要求抽自己的血。

输血必须血型匹配，可当时根本来不及验血。就在大家六神无主时，白求恩再次展现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仁爱和果敢。李朝选回忆：“我们都争着献血，白求恩说，‘来不及验血了，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，赶紧抽’，我们哪还忍心抽他的血，但他坚定地说，‘战士们在流血牺牲，我献点血算什么？不要争了，抢救伤员要紧’。说着，他挽起袖子。同志们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决定，只好把针管插进他的血管。随后，他又把自己的血输进彭清云的身体里。”

输血后，白求恩紧接着做截肢手术。可问题又来了：现场没有手术锯。大家赶紧从工兵那里找来一个锯木头的工兵锯。白求恩先是对工兵锯进行消毒，后开始截肢手术。他发现彭清云的右臂感染实在严重，没法多保留，最后只能狠心锯到了胳肢窝的地方。

历经波折终于完成了手术，白求恩也筋疲力尽，但仍坚持守在病床前观察彭清云的恢复状况，还细心给他喂水喂药。庆幸的是，彭清云的生命体征终于平稳下来，他被白求恩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二

在给彭清云做手术成功后不久，1938年11月，白求恩再次收到紧急求救的消息。这次他急切要去的是灵丘石矾村，救助彭清云的战友、第717团参谋长左齐。

几天前，左齐率部在涞（源）蔚（县）公路上的明铺村打了一场伏击战。战斗激烈时，左齐不幸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右臂，伤势严重。

匆忙赶来的白求恩查看了伤情。令在场人没想到的是，性格一向温和的白求恩，突然冲着护送人员发了火。原来，由于大家缺乏医疗知识，在左齐受伤之后，止血带绑得太紧、时间过长，导致左齐的整个右臂彻底坏死！

白求恩痛心地摸着左齐发黑的右臂，立即为他做了截肢手术。后来左齐右臂的伤口因为感染总是愈合不了，前线又缺少抗菌类药物。白求恩将他从加拿大带来的磺胺给左齐服用，保住了左齐的生命。

三

白求恩在灵丘这片炽热的土地上，连续打了两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争夺战，用精湛的医术，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两位抗日英雄的生命。

在抗日前线，白求恩被我军官兵在极端痛苦中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深深触动。看着官兵不畏病痛、咬牙坚持的劲头，白求恩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。他们遭遇过残酷，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；他们尝受过苦痛，可是知道怎么笑；他们受过无穷苦难，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、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。我已经爱上了他们，我知道他们也爱我。”

白求恩深知，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。面对残酷战争中不断涌现的伤员，仅靠他一个医生是远远不够的。他更宏大的心愿，就是要为这支英勇顽强但缺医少药的部队，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。于是，在灵丘下关乡杨庄村，白求恩创办了特种外科医院，举办“实习周”，培养医务骨干。

令人痛心的是，1939年白求恩在为伤员做手术时不幸感染。11月12日，他在河北唐县与世长辞，时年49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左齐以独臂投身新疆建设20余年，还坚持练习书法，成为“左笔书法家”。为了表达对白求恩的感谢和敬仰，左齐专门请画家画了一幅白求恩的肖像挂在家中。

彭清云同样终生铭记白求恩的救命之恩。1988年，在白求恩为他做截肢手术过去50年时，彭清云特意写下诗句：“血脉勃勃五十载，长忆英雄白求恩。逝者已矣生者老，满江春水满江红”，以寄托对白求恩的深切怀念。

岁月流转，白求恩的身影从未在彭清云与左齐两位将军的心中模糊半分。那份跨越生死、超越国界的情谊，早已刻进他们的心里。

白求恩手中的手术刀，在绝境中抢回了众多抗战军民的生命，刻下了国际主义的不朽丰碑。历史将永远铭记这跨越山海的友谊。

记 史

跨越山海的呐喊

——抗战时期我党我军的对外宣传

■李奇峰

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，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，我党清醒认识到，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，要赢得抗战胜利，除了宣传和动员全党全军以外，必须广泛进行对外宣传，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及海内外一切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。我党以卓越的政治远见，既抓“枪杆子”又抓“笔杆子”，对外宣传工作取得显著成效。其中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仅当好了战斗队，也很好地发挥了对外宣传作用。

1937年8月，我党领导成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刊物——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《救亡日报》，正式创刊。该报编辑委员会及编辑部人员中既有共产党员，也有国民党员，夏衍（共产党员）、樊仲云（国民党员）任总编辑，开办经费由国共双方各出500元。

10月，在周恩来、叶剑英等人的直接领导下，潘梓年、章汉夫、吴敏等人在南京筹办了《新华日报》和《群众》周刊。这是我党的新闻事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首次在国统区公开亮相。

11月，在周恩来的主持和倡导下，范长江、恽逸群等新闻工作者于上海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（简称“青记”）。这是我党领导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，其宗旨为团结全国新闻工作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“青记”组织战地记者报道前线战况，并出版《新闻记者》会刊。

1938年初，“青记”迁至武汉，于3月末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选举范长江、徐迈进、钟期森为常务理事，将“青记”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。后来，这一学会除设在武汉的总会以外，还在广州、香港、桂林、成都、重庆、延安、兰州等地成立分会，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，为抗战宣传作出突出贡献，也为1949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奠定了基础。

在1938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对外宣传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。会议认为“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，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，都太薄弱了。”此后，我党的对外宣传步伐大大加快。

1938年1月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，主任为廖承志。起初，办事处主要是为我军募集抗战物资，后来增加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宣传基地，致力于向世界说明我党的抗日主张和事迹。

1940年9月，廖承志致电延安侨委与周恩来，建议加强海外宣传工作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我党向海外派出了一批党员。这些党员或进入当地侨报工作，或创办报刊，初步构建起在海外的宣传阵地。东南亚地区，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海外抗日办报宣传活动最为活跃。据统计，仅1937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段时期，华文报刊就有数十种，其中以胡愈之、郁达夫等抗日爱国人士主办的报刊影响最大。此外，美洲地区的《美洲华侨日报》、欧洲地区的《联合战线》《祖国抗日情报》等报刊，都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己任。

为配合党的对外宣传工作，我军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一系列战地报纸，积极展开对根据地军民宣传和对外宣传。比如，1939年1月，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，由毛泽东、王稼祥、萧劲光等组成编委会。刊物以宣传抗日主张、总结军事政治经验为宗旨，刊载中国共产党宣言、领导人文章、战斗总结及苏联军事译文。刊物不仅深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欢迎，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深有影响。同年12月，在刘少奇主持下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创办《抗敌报（江北版）》，于1940年改名为《江淮日报》，由刘少奇兼任报社社长。该报围绕“坚持团结、反对投降分裂”的方针，在揭露日军诱降阴谋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、盟军反攻日军的时机迫近，国际人士十分关心中国战场，特别是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。在此背景下，国民党不得不解除对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严密新闻封锁。1944年初，经过多方努力争取，蒋介石批准美英等国记者赴延安采访。随后，这些记者们组建记者团，准备赴延安参观采访，但受到国民党的阻挠。我党将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访问，看作是在国际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，千方百计打破国民党的阴谋和阻挠，很好地抓住了这次对外宣传的机会。

八路军晋绥军区主动邀请记者团现场观摩1944年9月收复娄烦镇的战斗。记者团目睹了我军指战员英勇战斗的场面，看到人民群众冒着敌人炮火运送弹药、转运伤员，以及将烧饼送到战士们面前等场景后，深受震撼。路透社记者武道在《大美晚报》发表《我从陕北回来》长篇通讯：“关于第十八集团军（1937年9月，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，八路军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，但八路军的称呼仍被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习惯地沿用下来。编者注）是否在和敌人作战，我能够回答‘是的’，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！”据统计，仅外国记者在延安拍发的电讯就达100多篇，大量报道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。可以说，这次记者团对延安的成功访问，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里程碑式事件。

抗战时期，我党还在解放区创办了数百种报纸、建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。这些媒体不同程度承担对外宣传任务，不少媒体的创办人同时也是人民军队的指战员。这一时期我党我军的对外宣传力量，在异常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逐渐发展壮大，探索积累了十分丰富、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，为后来我党领导新闻宣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。

1944年，记者团成员之一福尔曼拍摄的陕甘宁边区民兵。 资料图片

军史文苑

风过神头岭

■孙 彤

风掠过晋东南的沟壑，带着粗粝的沙哑。站在神头岭上，恍惚还能听到80多年前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，久久不散……

1938年3月上旬，侵华日军沿着邯（郸）长（治）公路猖狂进犯，妄图进一步扩大侵略。邯长公路是日军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线，沿线布满据点，运输车辆往来频繁。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、政治委员邓小平敏锐察觉到，这条补给线上的各据点兵力分散，正是大好的歼敌之机。于是，“围点打援”的作战方案应运而生——以守备较为空虚的黎城为“点”，佯攻诱敌，诱使潞城敌军出兵增援，然后发起一场伏击战，在途中将其歼灭。位于黎城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，距离两地较远，日军难以迅速支援，且便于我军设伏，因此成为我军伏击敌人的首选之地。

战前，刘伯承带人到现场一看，倒吸一口凉气——地图上标注的峡谷竟然是开阔的山梁。他不禁长叹：“粗枝大叶可要害死人啊！”原来伏击点所在的公路不是如地图所标位于岭下，而是盘亘在岭上，蜿蜒而过。

以往打伏击战，我军一般选择峡谷地带设伏，将敌人包围在山谷之中。可神头岭却是中间凸起，两侧凹陷，这样的地形容易暴露伏击位置。然而，刘伯承围绕山岭仔细观察后，重新核对了地图，最终提出计划不变。

险地设伏，出其不意。梁上狭窄，这对伏击一方是个限制，但对日军来说，是更大的限制。刘伯承认为，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，武器装备难以展开，骑兵也失去机动能力，有利于发挥我军的近战优势；公路边还有之前挖的旧工事，日军不易发觉，我军也可以利用起来，便于突击。

我军进入神头岭伏击地区。 资料图片

任务落在第386旅旅长陈赓肩上。他令第771团埋伏在神头岭北侧，令第772团埋伏于公路西侧，补充团埋伏在公路东侧。一场伏击战即将展开。

春寒料峭，清冽的风弥漫在山谷中。旧工事边，几茎衰草在风中抖动。我军官兵埋伏在路旁石头后的枯黄草丛里，他们的眼睛盯着远方，枪口对准了公路。

3月16日凌晨，隔山相望的黎城方向，枪声骤起——我第769团开始佯攻。枪声如诱饵撒进太行山，黎城守敌猝不及防，急忙向潞城之敌求援。随即，潞城日军以步骑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。

约9时半，日军主力进入我神头岭设伏区域。我军隐蔽良好，未被日军发觉。见时机已到，我军发起攻击。旧工事中，枪声阵阵，手榴弹如骤雨般砸向敌人，炸得日军阵脚大乱，四散奔逃。我军从石后、草间跃起，喊杀声响彻山梁。

我第772团和补充团实施夹击，将日军截成数段；第771团于正面发起猛烈进攻，对敌实施迎头痛击。日军顿时乱作一团，其重型装备无法有效架设，战斗队形被极度压缩，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，死伤惨重。

日军主力在伏击圈内被基本歼灭后，一部残敌突围退入神头村内，企图依托村庄的民房和窑洞负隅顽抗。这些窑洞窗口狭小，易守难攻。日军据此构筑了火力点，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。我军立即组织强攻。战至中午，日军除百余人逃回潞城外，其余全部被歼。

此战，我军毙伤日军1500余人、缴获枪支550余支、骡马600余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，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沉重打击。日军汽车部队一名伍长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第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。”一名目睹战况的日本随军记者，曾写了一篇名为《脱险记》的通讯，称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的“典型游击战术”。

战争不仅是力量的角逐，更是智慧的博弈。当年的伏击场上，已立起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碑名的“神头之战纪念碑”。静卧的石头上还留有当年的弹痕。神头岭的风声仿佛仍在诉说那一场用勇气和智慧书写的传奇。那些在山梁上一跃而起的年轻身影，其忠骨已深植于这片热土，化为不朽的丰碑。

军史发现

长征

第6565期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 银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